

## 第二講

### 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

#### 總論

在這一講里，我們要講中國現代文學誕生的歷史背景，包括國際的和國內的兩個方面。學這一講，我們應該知道，中國古典文學從《詩經》開始，發展了二、三千年，在各個時期都取得了輝煌(huāng รุ่งโรจน์)的成就，可是為什麼到了二十年代前後，卻發展不下去了，被一種新的文學代替；這個變化的過程是怎樣的；有哪幾位主要人物；他們都有什麼主張，及各種新文學形式出現時的情況。

#### 第一節

##### 新文學誕生的歷史背景

###### 一、近代中國人尋找民族苦難的原因

我們說中國現代文學從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開始，但實際上，現代文學的產生，是作為文化革命的結果，它有着更深遠的國際國內背景，這裡，我們還要把話說得遠一點，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古典文學轉變到現代文學的過程。

如果學過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那就知道，在一八四零年到一八四二年這間，中國和遠在歐洲的英國之間發生了一場“鴉片戰爭”(สงครามฝิ่น)，這場戰爭的失敗，對中國人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化和經濟在全世界上，都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和文人們都認為，中國是在世界的中心，地方大，人口多，歷史悠久，文化先進，是最強大的國家。直到這時，中國與西方新發展起來的國打了敗仗，腐(fu)敗(

)無能的晚清政府沒有意識到外邊的發展。

從此以後，在不到六十年的時間里，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對中國發動了六次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五六一—一八六零)、中法戰爭(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一九零零)等。戰爭的結果，是中國被迫簽訂一個又一個的不平等條約，不僅失去了臺灣和香港，還失去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國家主權。所以說，西方列強是用槍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並且，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半封建(กึ่งดินนา)、半殖民地(เมืองขึ้น)的國家，使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更加艱難了。

一次又一次的戰敗，國家受到欺辱(รุ้รังแก อับยศ)，這樣一個古老的文明大國，就連一直被看作“小日本”的島國，也來用武力取得好處，這些事實，使一些有眼光的少數統治者和知識分子開始思考，怎樣才能使封閉落后的中國，走向改革，發展實力，重新強大起來。這種尋找國家富強的道路，有一個從物質到文化的過程。

###### 二、從發展經濟到學習西方社會制度到改造文化思想。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知識界探索中國富強的道路，經歷了四個階段，文化思想發生過三次變化。

1. 十九世紀六十到九十年代的“洋務運動”，是中國上層有實權的官僚(liào, ขุนนางชั้นผู้ใหญ่)知識分子，如李鴻章(hōng)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提倡的，中心是經濟改革，目的是鞏(gǒng)

มีเสถียรภาพ)固現有的制度,辦法是學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制度,與辦現代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口號是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意思是學習西方,是一些有實際用處的東西,至于文化思想方面的,還是要堅持中國傳統的。盡管如此,他們建工廠,辦學校,派留學生,翻譯西方書籍,這些作法還是和傳統思想中反對“利”、“技”觀念發生矛盾,受到守舊官僚的極力反對。特別是這一時期出現的中國“冷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零)和魏源的作法和主張,更是統治者不能容忍( ยอมทน )的。一八九四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大敗,也標志着洋務派的失敗,也使“維新運動”受到更多人的重視。

維新派是在洋務派的基礎上產生的。維新派也稱“改良派”,他們主張的中心是學習西方君主立憲( รัฐธรรมนูญ)制度,改良中國政治,主要人物都是一些沒有正式地位的有名知識分子,如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嚴復(一八五二—一九二一)、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等人。他們的目的也是維護現有的封建統治,但要求改良政治,即封建君主的統治方式,辦法是希望通過最高統治者的力量,從上自下推行他們提出的一整套措施。維新派的重要工作,除了向統治者提供正式的改良建議外,特別重視社會宣傳,開發民衆的思想。所以,他們大力辦雜誌,寫書譯書,作演講,介紹宣傳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他們的主張和批判都是不徹底的。依靠光緒皇帝所進行的“百日維新”(一八九八.六.十一—一九.二十一),損害了晚清官僚的實際利益,很容易地就被慈禧(cixi)太后鎮壓(ปราบปราม)下去了。

但是維新運動期間,“改良”也開始進入文化、文學方面。已經開始提倡(ช่าง, ริเริ่มส่งเสริม)“新文體”、“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特別是黃遵憲(xiàn)提出“我手寫我口”的口號,已經意識到文言文“格律詩”的刻板(ตายตัว)限制,要求怎樣想就怎樣寫,自由表達。在這麼早的時候,甚至還有人提出了文字改革。

到了一九一一年十月一日,“辛亥(xīnhài)革命”爆(bào)發。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這場革命,政治上不走改良的道路,而是革命,即目的是用武力推翻清朝的統治。“辛亥革命”的政治目標實現了,它結束了中國兩千一百多年的封建統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一個共和制(ระบบ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的新國家——中華民國,和“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相比,這是一場更廣更深的社會大變革。但在文化方面,“辛亥革命”的革命派同維新派並沒有大區別,都是以政治改革為中心的啟蒙主義( ลัทธิเณะริเริ่ม )文化思想。在文化思想方面,除了一些表面上



李大釗

的反封建,如婦女不再纏(chán)足(รัดเท้า),剪掉辮(biàn)子(เปีย),批判封建迷信(เชื่องมงาย)外,對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倫理道德思想並沒有進行徹底批判。

所以說,“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方面,並沒有來得及做太多的事情。雖然在革命過程中,出現了白話寫的報紙和應用文,但正式的文體還是要用文言文。

不過,因為“辛亥革命”沒有使中國結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沒有改變人之間的剝削(ขูดรีด)壓迫關係,這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進一步思考,中國在近代長期落后不前的原因。

同時,“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還在於,它打倒了皇帝,使中國人的思想發生了一次從沒有過的大解放。

既然皇帝老爺也能推翻，那世界上還有什么不能改變的呢。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在歐洲大陸爆發，這使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得到了一次發展的機會。這時他們有了為發動一場批判封建思想運動的能力。而且又是正在這時，在俄國發生了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他們在地球上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新國家。這使中國人看到，不但天子皇帝可能打倒（ล้ม），而且窮苦的工人農民也可以掌握國家的權力。這在以前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在今天成為了現實，使中國人的思想又來了一次更大的解放，這個世界真的要大變了。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后，中國很多大知識分子，很快地就第一次真正地接受了一個完全西方的新學說——馬克思列寧主義。

### 三、“五四”新文化革命發生

“五四”運動本身，是一場反對帝國主義欺侮中國的政治運動。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法國、美國等一些戰勝國家，在法國首都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也派代表參加了這次“巴黎和會”，但會議最後竟通過“和約”，把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殊權利（สิทธิพิเศษ）轉給日本，這種侵略中國主權的行為，使中國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本質，每個普通的中國人都覺得，一百多年來被欺壓的地位再也不能忍受了。所以，先是山東人民抗議（คัดค้าน），五月四日北京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舉行更大規模的抗議，六月三日全國各地工人罷工。這次運動最後取得了勝利。

“五四”運動在政治上，標志着中國人民自覺地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開始，在文化上也標志着中國文化革命的開始。我們把“五四”運動也叫做“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文學革命、或“五四”白話文運動。

“五四”運動使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從精神文化方面來發現中國近代落后的原因，從而認識到反對封建文化，進行倫理道德（จริยธรรม）革命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chàng）導者們，都是在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運動取得成果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他們多數人都曾在歐洲、美國或日本學習過，有中國古典文化的基礎，又對西方文化有着很深入廣泛的了解。

洋務派認為，要使中國擺脫西方新興強國的欺壓，根本的要學習西方物質文化，即科學技術，生產管理等；維新派和辛亥革命派主張根本的是學習西方制度文化，即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只有“五四”新化才真正看到了精神文化的根本作用，提出了中國人精神重建問題。即改造中國國民的精神，批判傳統的封建道德，提倡倫理道德的革命。所以，我們看到，一百年來，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新文化派，他們分別從經濟、政治到文化探索（สืบหา ค้นหา）中國的富強之路，是一個從外在的，表面的逐漸到內在的，深層的認識過程。所以，毛澤東曾對“五四”運動的文化意義有過很高的評價，他說：“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內容，所以，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革命、道德革命，不能不和文學革命聯繫起來。

民主(Democracy)和科學(Science);李大鈞(一八八九—一九二七)向青年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和蘇聯“十月革命”,宣傳了一種全新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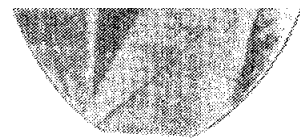
思想的大變革必然會引起文學的大變革。到一九一七年初,《新青年》的作者們就把注意力轉到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方面。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一八九—一九六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雜(論)議》。他認為,要改變舊文學,需要從這“八事”開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語俗字。這篇文章是最早討論文學改革方式的主張。并提出白話文學應該成為中國文學的正宗,這篇文章標志文學革命正式開始。

接着,陳獨秀也發表了一篇同樣重要的文章《文學革命論》。文章中提出的新文學的“三大主義”,討論了新文學的服務對象,創作方法和社會作用。

胡適,陳獨秀文學主張提出后,又有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等人參加,這樣,文學革命就逐步開展起來了。

文學革命開始后,主要是兩方面的任務。一是批判舊文學,一是探索怎樣建設新文學。在批判方面,錢玄同的態度最激烈,他猛烈地指責那些模仿(เลียนแบบ)古人寫文章的文人。在建設新文學方面,胡適關心的是文學的語言形式。他說文學創作必須使用白話文,因為“白



陳獨秀







